

马平安·著

清末变局中的 袁世凯集团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马平安·著

清末变局中的 袁世凯集团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末变局中的袁世凯集团 / 马平安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334-6979-5

I. ①清… II. ①马… III. ①袁世凯(1859~1916)
—人物研究②中国历史—研究—清后期 IV. ①K827=52
②K25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2660 号

Qingmo Bianju Zhong De Yuanshikai Jituan

清末变局中的袁世凯集团

马平安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网址: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62027445
发行部电话:010-62024258 0591-87115073)

出版人 黄旭

印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福州市福兴投资区后屿路 6 号 邮编:350014)

开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

字数 274 千

插页 2

版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6979-5

定价 48.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电话:0591-83726019)调换。

前 言

袁世凯集团形成期的轮廓和研究前瞻

晚清社会 70 余年，是近代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特别是清末 10 余年，由于新政的举办，诸多方面的变化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在这场“旷古未有之奇变”中，中央权力衰退，地方汉族官僚的力量在急速膨胀。富国强兵的迫切要求与袁世凯集团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迅速崛起，成为这个时期一个十分重大的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在清末短短 10 余年间，袁世凯集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出了地方，成为清末社会、政治大舞台上举足轻重的显要角色。袁世凯集团的出现形成了对清政权合法地位的巨大冲击力，加剧了清王朝皇权资源的流失，打破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均衡，使清政权迅速进入了最后阶段，即灭亡阶段。这种深刻的变化，对清末乃至此后整个近代中国社会进程的变化，无疑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袁世凯集团，是指承传湘、淮集团发展而来，利用清末中央政府拙于应付内外危机的时机，利用小站练兵与新政这些合法条件迅速形成并发展壮大起来的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具有私人半私人性质的一个军事、官僚集团。这一集团首先是一个军事团体。它以小站练兵为起点，以新建陆军为基础，逐渐扩展，到北洋六镇时期臻于完善和强大，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它又是一个官僚团体。正如有学者指出：“对于这个北洋派内部的实际情况，除了军事方面的问题外，目前尚未进行充分的研究。一提起北洋派，人们便会立即想到北洋军阀，然而北洋派的内部结构绝非仅由军阀构成，其中还有以北洋为基础

的官僚集团存在，这是不容忽视的。北洋官僚集团，机构庞大，而且拥有复杂的内部组织，其中一部分人控制着北洋派的财政经济部门，对于北洋派的势力伸展曾经起过重要作用。”^①这一集团在清末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产生并发展，反过来，它又对清末时局的变化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加速与催化作用。历史的真实情况是：袁世凯集团在产生、发展壮大起来后，并未给清王朝改变内忧外患的现状起到什么关键性的补救作用，相反，由于这一集团在国内政坛上的迅速崛起与国家军队的私人化等因素，倒成为清王朝内部的蛀虫与妨碍清政权统治稳定的最大的隐患。

清末袁世凯集团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其军事团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新建陆军时期（1895年11月—1898年12月）；（2）武卫军时期（1898年12月—1902年初）；（3）北洋常备军时期（1902年初—1905年初）；（4）北洋六镇时期（1905年初—1912年初）。

其官僚团体的发展，脉络也十分清晰，表现在：（1）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1895年11月—1899年12月）；（2）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期（1899年12月—1901年11月）；（3）袁世凯督直时期（1901年11月—1907年9月）；（4）袁世凯任军机大臣与内阁总理大臣时期（1907年9月—1912年3月）。在清末，这个集团势力大时，“东三省、热河、直隶、山东全部，与江苏、河南的大部分”^②尽为其所有。具体说来：

（1）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是袁世凯集团的发轫时期。在甲午战争中，淮军基本覆灭，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军事力量不复存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急急以练兵救亡为务，中国传统的军事体制正处在一场重大变革的关节点上。袁世凯抓住这个珍贵时机，经过上层运动获得了训练新军的特权，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底到达天津小站练兵。小站练兵使袁世凯获得了发展私人势力的机遇。他以德国陆军为样板，建立了一支不同于过去任何派别的军事力

① [日]渡边淳：《袁世凯政权的经济基础——北洋派的企业活动》，载《国外中国近代化史研究》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8页。

② [台]刘凤翰：《武卫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编印发行，第799页。

量，从而使北洋系由淮军集团中分离出来。袁世凯以小站为基地，以新建陆军为班底，大肆招揽当时的军事、洋务及擅长文案方面的人才，从而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班底。也就是以这个核心班底为起点，以新建陆军为政治资本，袁世凯集团势力才日渐壮大起来并最终夺取了清王朝的政权。正如曾任袁世凯政府内务总长的张国淦所说：“新建陆军只七千人，规模并不算大，但其组织甚强，其后势力日张，几乎布遍全国。民国所谓北洋军阀者，如大总统、副总统、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巡阅使、检阅使、各省督军、省长，以及军长、师长、旅长都出自小站。”^①

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由于大清王朝传统体制的僵滞性和专制政治与文化的强大惰性，局部的政策调整已远不足以解决民族的生存危机，推进较大规模的制度创新是摆脱危机和实现富国强兵目标的必由之路。而为了使这种制度创新得以实现，就涉及对传统的政治运作秩序、官僚制度、政治参与的固有方式、对社会进行动员的方式等进行变革。在当时严重的民族危机与士大夫普遍觉醒的条件下，就出现了书生康有为、梁启超利用没有实际权力的光绪皇帝试图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自救运动。这场救亡运动虽然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不具备以及变法领导人急躁冒进等错误而悲壮地失败，但这场救亡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不是可有可无的一段插曲，它对于当时尚处在嫩芽状态中的袁世凯集团之命运，和以后袁世凯集团能否发展之命运，影响实属巨大。单就对袁世凯集团的发展来说，这场运动就是继甲午战后为它提供的第二次发展的机会。因为，此时的袁世凯虽然身在小站练兵，而他的心实际上却一直在国家政治舞台上进行角逐。“袁热中赋性，岂能郁郁久居。”^②他对政治的兴趣远远超过对军事的兴趣。袁世凯的雄心决定了他不可能甘心就这样长期蛰伏在偏僻的小站。时机终于来了，而且恰恰不早不晚，正是袁世凯小站练

① 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②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张伯锋、荣孟源主编：《近代稗海》（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3页。

兵的紧张阶段暂告结束的时候，这样，袁世凯、徐世昌就有了到北京从事运动关节的时间。袁世凯、徐世昌一到京城，就参与到了当时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中。实际上，他们早就参加了强学会，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来往甚密。正因为有此经历，才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梁举荐，光绪皇帝亲自召见，破格擢升袁世凯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宜并使袁世凯身价倍增的奇遇。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维新派产生了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与变法命运之赌注押于袁世凯军事团体上面的想法与做法。袁世凯的告密加速了变法运动的流产，也使袁世凯从此获得了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与权臣荣禄的赏识和信任，从而使袁世凯及其团体得以攀龙附凤，进入了中央最高层的视野圈内，为其日后就任山东巡抚、壮大团体势力，奠定了坚实的上层关系的基础。

（2）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期，袁世凯集团开始发展成为一个军事政治团体。在小站时期，袁世凯集团虽然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班底，但它主要还是一个军事团体。到了山东以后，袁世凯的官做大了，地位上升了，也有了发展自己势力的固定地盘和可以自由操纵的财权，这样，他就在此基础上开始广揽人才，招兵买马。除了将山东原有的旧军裁汰、整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外，还接受、消化了张之洞数年苦心练就的自强军力量。不仅如此，他又大开幕府，开始招揽省内外各种洋务人才，将山东各地原有的官僚加以裁汰、重整，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样，袁世凯集团从此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官僚二者相结合的地方团体，成为一个继李鸿章淮系势力衰败之后重新崛起的一个新的军事政治集团。山东时期是袁世凯集团迅速发展并取得列强瞩目与接受的阶段，也是其成为清政府愈来愈倚之为柱石的时期。

（3）袁世凯督直时期是袁世凯集团高度发展并开始影响朝政的时期。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位列疆吏之首。他以清末新政为契机，彻底接受消化了李鸿章遗留下来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力量，延揽国内外大批有用人才，重用回国留学生，将一些新鲜血液注入本集团肌体之中，广泛示好封疆大吏与接近朝中权贵，大大扩展了自己的军事官僚集团势力。在新政中，袁世凯集团的军事、经济、教育、巡警等事业办得轰轰烈

烈烈，有声有色。大批人才蜂拥至北洋门下，直隶一时成为中国的模范省，“各行省咸派员考察，籍为取法之资”^①，“论维新者，莫不奉天津为主臬焉”^②。袁世凯集团在此期间高度发展，其集团班底基本上渐趋稳定下来，积累了雄厚的人才、政治、军事与经济资本，并且开始以其雄厚的实力影响朝政，这为该集团从地方走向中央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4) 袁世凯任军机大臣与任内阁总理大臣时期是袁世凯集团与满洲权贵矛盾激化、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也是袁世凯集团开始与清政府从私下矛盾逐渐发展到公开对抗的时期。袁世凯集团势力的膨胀引起了满洲亲贵与朝廷的猜忌，他们开始削弱袁世凯的权力，抑制袁世凯集团的发展。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去世，宣统朝权力出现真空为时机，满洲亲贵罢斥了袁世凯及其集团中的一些重要人物，袁世凯集团与满洲亲贵的相对合作关系从此遭到严重破坏。随着满汉之间民族矛盾、中央与地方矛盾、立宪派集团与朝中权贵的矛盾、革命党与清王朝的矛盾的交织发展与激化，最终催发了辛亥革命。但此时朝廷“神器”已为袁世凯所窃取，袁世凯集团支持袁世凯出山压迫革命党并迫使清廷退位，最终夺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袁世凯集团从此从地方走向中央。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让人无法预料政局变化与发展的时代，这就是袁世凯集团蜕变后的北洋军阀混战时代。

总结过去学界关于袁世凯集团史的研究，虽然已有数种著作与多篇文章奠定基础，出现了蓬勃向上的形势，但展望前景，尚有广袤园地有待感兴趣的学者去辛勤耕耘。

(1) 袁世凯集团与湘淮军集团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袁世凯集团与曾国藩的湘军集团及李鸿章的淮军集团既有不同，又有联系。这一方面，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还需加强深入探讨与研究。袁世凯集团受湘淮军影响很深，但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这一政治军事

① 甘厚慈编：《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序，北洋官报兼印刷局代绦雪斋书局印，宣统二年夏初版。

②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三，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集团在内部经济，在思想意识，在建军方式等方面，与湘淮军有无因袭关系。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角度，对这方面的内容尚需花大气力进行发掘与研究。在这一方面如若深入下去，不仅要靠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还需要用经济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给予科学的启示与引导。

(2) 从军事史角度研究晚清袁世凯集团的学术成果还很薄弱

袁世凯集团倚仗新建陆军发迹，凭借北洋六镇的武力最终夺取了国家最高政权。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算是一部军事史。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从军事史角度对此的研究恰恰是较为薄弱的。新中国成立前曾有军事家蒋方震著《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最近五十年》申报馆1923年编印）、丁文江著《民国军事近纪》（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文公直著《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太平洋书店1932年版）等专著，对军阀混战等纷乱的军事现象和民国以来的军队状况进行了较系统的叙述。新中国成立后张玉田等编著的《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近代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和解放军出版社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军事史》，都是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史有价值的参考书，但由于体例关系及其他原因，袁世凯集团在中国军事上的地位在书中不能展开论述。不仅如此，即使有关袁世凯集团在晚清的文章也较少以军事角度为直接研究对象进行论述。多年来，有学者对袁世凯在清末时期的建军、办校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但总体来说，除了台湾刘凤翰所著的《新建陆军》、《武卫军》二书以及罗尔纲的《陆军兵志》自成体系外，其他成果在专门探讨袁世凯集团在近代军事上的成就与地位等方面都还需要系统、深入与完善。例如，袁世凯集团对清末练兵处的利用问题，北洋六镇军饷问题，袁世凯对北洋六镇操纵艺术、慈禧对待袁世凯练兵的真正态度等，都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潜心探讨和研究。由此看来，军事史研究较为薄弱的现状正是今后史学工作者大有作为的领域。

(3) 从经济史角度揭示袁世凯集团的专著与文章也不是很多

袁世凯集团在晚清的经济活动，30多年来，不少学者对此倾注了大量心

血,关于袁世凯集团在新政时期的经济作为的文章已经不少,专著也有张华腾、苏全有合著的《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但是,有关袁世凯集团内部在晚清时期经济活动更深入更全面的文章与专著却是一个很大的空白点,除了个别学者对周学熙以及袁世凯在北洋实业中的作用多少有所探讨与研究外,几乎没有什么成果对晚清时期袁世凯集团内部的经济活动情况进行过全面、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与论述,在更高层面上研究的成果亟待问世。

(4) 袁世凯集团人物的研究需要加强

关于袁世凯集团成员的研究,多年来,学者主要把眼光聚集在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周学熙、曹锟、吴佩孚等主要人物身上,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袁世凯集团在晚清之所以能够坐大,并不仅仅是上述人物的功劳,其集团成员形形色色,精英分子很多,如王士珍、张勋、赵秉钧、杨士骧、张一麟、严修、王锡彤、梁士诒等人物就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只有从各个角度探讨袁世凯集团各阶层人物在晚清时期的所作所为,才能真正将袁世凯集团在晚清时期的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5) 晚清时期袁世凯集团与列强关系的研究需要加强

在晚清,有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这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等事务的干涉大大加强。袁世凯集团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除了其自身力量外,与列强各国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或者说,如果帝国主义列强在袁世凯集团形成期有意要反对它的话,袁世凯集团很可能就会因此而夭折。可是,长期以来,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几乎就是一个盲区,即使有少数文章或著作中对此多少有所提及外,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成果还有待于问世。

(6) 袁世凯集团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需要研究

袁世凯集团深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可是多年来并未见到有学者在此方面进行探讨与研究。中国的帝王文化、封建时代的人情世故、人物交际与往来的准则、传统的价值观念等都深深地浸淫在袁世凯集团的形成与发展过

程中，对于这一领域，希望有学者能够进行突破。

总之，袁世凯集团形成期的研究大有可为，只要研究者在研究的方法上，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避免简单化、片面化、脸谱化、宣传化等倾向，耐心、深入地去挖掘史料，开拓思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相信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与探讨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目 录

前 言 袁世凯集团形成期的轮廓及研究前瞻 / 01

第一章 袁世凯集团与淮军集团的渊源 / 001

第二章 袁世凯集团在清末发展的阶段划分 / 023

第三章 袁世凯的用人思路 / 053

第四章 袁世凯集团内部的职掌 / 089

第五章 袁世凯集团成员的层次与类型 / 121

第六章 袁世凯集团与清末新政 / 139

第七章 袁世凯集团与满族亲贵之间的争斗 / 167

第八章 徐世昌在宣统年间的长袖善舞 / 189

第九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庆袁关系 / 207

第十章 袁世凯集团与光宣政治 / 225

附 录 参考文献 / 269

第一章

袁世凯集团与淮军集团的渊源

袁世凯集团与淮军集团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渊源。袁世凯由李鸿章一手栽培而成，李鸿章是淮军集团的重要成员。袁世凯在淮军集团中有着深厚的背景，这为他后来建立自己的势力奠定了基础。

袁世凯在淮军集团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他逐渐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

袁世凯在淮军集团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逐渐掌握了淮军集团的运作规律。袁世凯在淮军集团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这为他后来建立自己的势力奠定了基础。

袁世凯在淮军集团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这为他后来建立自己的势力奠定了基础。袁世凯在淮军集团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这为他后来建立自己的势力奠定了基础。

袁世凯在淮军集团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这为他后来建立自己的势力奠定了基础。袁世凯在淮军集团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这为他后来建立自己的势力奠定了基础。袁世凯在淮军集团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这为他后来建立自己的势力奠定了基础。

袁世凯集团与淮军集团二者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袁世凯由李鸿章一手扶植而成，袁世凯集团也是由淮军集团脱胎、继承而来。鉴于袁世凯与李鸿章关系的特殊性以及淮军集团对袁世凯集团的重大影响，本章拟对此作一简要的探讨。

一、“北洋”的由来

所谓“南洋”、“北洋”之说，鸦片战争前已有之，但那是一种地域概念。包世臣在《海运南漕议》中说：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通海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但“南洋”、“北洋”真正作为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概念，则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始的。清末袁世凯集团作为一个政治名词的出现，那是更晚一点的事情了。

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中国割地赔款而告终。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对清朝政府的控制不断加强。与此相适应，清政府的统治机构也开始逐渐发生变化，陆续出现了一批专门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的机构。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当然也没有专门办理外交事务的机构和专职官员。有事时，对外交涉多由中央理藩院、鸿臚寺等负责办理，外国使臣也由礼部和理藩院负责接待，地方督抚除两广总督稍有例外，都没有对外交涉的权力。从鸦片战争时起，先是英国，继而有美、法、俄诸国，接连以军事、外交等手段向中国逼进，清政府不得不与之办理交涉；每遇交涉事件，清朝皇帝总是随时随事从沿海沿边地方督抚及将军中择人办理。这完全是对外事的一种权宜应付，丝毫不关乎体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才真正开始发生变化。

这期间，体制上有一点新变化，那就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五口通商大臣的设置。清政府落实中英《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口岸，于是五口通商口岸遂成为外国人从事各种殖民活动的法定地点，也成为中外交涉的法定地点，五口通商大臣应运而生，成为办理这些地方对外关系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清政府的洋务官员。五口分布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第一任五口通商大臣由清政府指定两广总督兼任；咸丰九年（1859年）起，改为由江苏巡抚或两江总督兼任。这样，五口通商大臣从设置之日起，就形成了由相关的地方督抚兼职的先例。

设置管理对外贸易的官员，这本是一个国家的正常措施。对于封闭型的清帝国来说，设置通商大臣，应该是政府机构近代化的起步。但是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炮舰的逼迫下所设立的五口通商大臣，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而是清政府应承侵略者的要求、配合殖民主义者进行不平等贸易而设置的洋务专员，这是清政府把对外交涉权力下放给地方的开始。

咸丰十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北京条约》而告结束。经过这场战争，英、法等国取得了公使驻京的权利。这一规定一旦实施，清朝中央政府将不得不与外国公使直接发生关系。为适应这一局面，咸丰十一年（1861年）初，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另外，沿海沿江开放口岸也大大增加，长江以南由原来的5口增为13口，长江以北新开3口。为适应这种变化，清政府在上海、天津分别设立“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大臣”和“办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大臣”。前者实际上由原来的五口通商大臣接任，后来演变为南洋通商大臣或南洋大臣；后者为新设，以后演变为北洋通商大臣或北洋大臣。总理衙门与南、北洋通商大臣的设置，成为中国近代新外交体制的滥觞。

清政府设置通商大臣，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来说，就是要把中外交涉限定在外地，防止外国人进入北京，以免干扰天子所居的京都。初时，广州是中国对外的门户，所以五口通商大臣由两广总督兼任，为的是把一切对外交涉都限制在广州。渐渐地，上海的地位超过了广州，于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两广

总督叶名琛被俘后，五口通商大臣的兼任者便变成了江苏巡抚或两江总督。兼职五口通商大臣的人变了，地方也变了，但清政府仍把外国人阻留在外地，把与外国人的交涉限定在外地，把中外之间的问题解决在外地这条原则一点也没变。五口通商大臣演变为南洋通商大臣是这样，新设三口（北洋）通商大臣也是这样。不过阻止英、法、美、俄四国入京已不可能，只好尽力阻止其他新来要求立约的国家。

南、北洋通商大臣职务的性质是相同的，但最初的职位却不一样。南洋通商大臣从设立之日起就由江苏巡抚兼任。其后除同治元年（1862年）一段很短的时间为专职外，一直由江苏巡抚或两江总督兼任。江苏巡抚或两江总督都是长江以南最主要的通商口岸上海所在政区的最高地方长官。照此体制，三口（北洋）通商大臣就应由长江以北最主要的通商口岸天津所在政区的最高地方长官直隶总督兼任。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三口通商大臣从设置之日起就是专职。一个兼职，一个专职，两者职位明显不同。江苏巡抚或两江总督因兼任南洋通商大臣而在清政府的外交体制中占有了一席之地，直隶总督无此兼职，便与外交体制无缘。

三口通商大臣驻扎天津，专办洋务，兼督海防，一就任就参与了国家外交活动。三口的通商交涉事务，最初由奕訢得力帮手，侍郎衔候补京堂崇厚担任，与南洋大臣相比仅缺“钦差”二字，驻天津。同治九年（1870年），随着通商事务扩大，加之此职脱离本省督抚而设置，有责无权，地方官吏往往“坐观成败”，不肯协助，因此，同年10月，工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他以暂署三口通商大臣参加过办理天津教案，对设置专职三口通商大臣的利弊得失有切身感受）上奏折提出，三口通商亦不必专设大员，所有洋务、海防均宜责成直隶总督悉心经理。经总理衙门议复，11月12日清廷发布上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毛昶熙请撤三口通商大臣条陈一折。洋务、海防本直隶总督应办之事，前因东豫各省匪踪未靖，总督远驻保定，兼顾为难，特设三口通商大臣驻津筹办，系属因时制宜。而现在情形则天津洋务海防较之保定省防关系尤重，必须专归总督一手经理，以免推诿而专责成。著照所